

憐憫與知曉的哲學推演

「良醫莫非」影視文本中自閉症患者的憐憫行為

唐允中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博士生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02) 29393091

(02) 02-29382063 (fax)

simon770617@gmail.com

憐憫與知曉的哲學推演

《中文摘要》

本文依據日常語言的哲學脈絡分析憐憫的運作機制與必要條件，配合學者蓋塔的論述脈絡抽離出知曉的概念，並引用心理學的心智理論做解釋，整理出憐憫與虛假意識的相互關係，接著提出質疑「憐憫是否依定要建構在知曉之上？」。研究方法採用維根斯坦式的哲學分析探究影視文本「良醫莫非」的劇中人物語言使用、行為與意義，藉著自閉症患者不具備心智理論的認知缺陷反向論證憐憫與虛假意識的關係並非必要，並引用莊子的惻隱之心提出了憐憫的另一種思考。

關鍵詞：心智理論、自閉症、虛假意識、憐憫、維根斯坦。

壹、 前言

本研究目的在於理解學術研究中不同領域對於「憐憫」的討論，再藉由大眾影視文本的幫助去分析這些行為及其背後的因素。憐憫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儘管其普遍存在於日常生活，但對於其概念的理解確是存在莫大的分歧，在倫理學以及臨床心理學中有諸多討論，甚至在傳播學研究的效果研究中也逐漸出現道德研究的相關分析(Huskey et al., 2018; Tamborini, 2012; Tamborini, Bowman, et al., 2018; Tamborini, Grall, et al., 2018; Tamborini et al., 2017)。本研究將從哲學以及心理學二種角度作切入，找尋其概念在影視文本中的體現與合理解釋。

德裔澳洲哲學家雷蒙·蓋塔(Raimond Gaita)的博士論文第十章(Gaita, 2004)中討論憐憫與痛苦的概念，使用維根斯坦哲學研究脈絡的語言分析不斷分析憐憫與虛假意識。本研究以此概念作為核心，採用維根斯坦式的語言分析，將複雜的哲學問題回歸日常生活的體現，會先藉由維根斯坦的「盒中甲蟲」概念說明，並以此概念表達「痛苦」的概念；接者以維根斯坦的哲學研究(Wittgenstein, 1953)中，280 至 294 條目解析蓋塔論述中所說明的，維根斯坦認為認知他人的痛苦是虛假的；接著延伸憐憫與靈魂的相依關係，在感知他人的虛假意識時，我們是否必須具備知曉他人的痛苦？試以幾個思想實驗的例子，分析蓋塔文中討論的憐憫，並帶入心理學的論述以補充。最後使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探究影視文本中呈現的人物形象與行為，以回答本研究的問題意識。

貳、 文獻探討

維根斯坦為 20 世紀早期的哲學家，其流傳後世的研究著作數量並不多，但每一本都足以被稱為經典，其獨特的格言式寫作風格特殊，留給後世許多的分析與評論空間。而本章將先闡述維根斯坦於其著作「哲學研究」中對於「痛苦」、「憐憫」的概念，並順著蓋塔在其博士論文中的的脈絡建構出其對於憐憫的完整論述。

一、 盒中甲蟲

在哲學研究(Wittgenstein, 1953)的第 293 條中，維根斯坦使用了甲蟲作為一個思想實驗的例子，這恐怕是與巴夫洛夫的狗(Pavlov's Dog)以及薛丁格的貓

(Schrödinger's Cat) 同樣出名的實驗寵物。假設在教室中分配給每一個人一個小盒子，盒子裡面放著一隻甲蟲，但我們見不到別人的甲蟲。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也假定每個人的甲蟲都是不同的，不存在同一隻甲蟲同時出現在二個人的盒子裡，我們甚至可以假設甲蟲是會變化的，甚至有些人的盒子裡面根本沒有甲蟲。如此一來「盒中甲蟲」是否能作為一種公共語言呢？這是對於指物命名的一種反思，當人們面對一種無法檢證的語言，我們是否可以使用這種語言呢？顯而易見的，這不是一種科學的語言，在早期維根斯坦的觀點中，這部分的語言形式是不可說的，其中所言說的東西也並非是可經驗的，然而不可說的語言卻存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將「盒中甲蟲」換置為「痛苦」，就會很容易理解維根斯坦在這邊想要表達的意義，我們都沒有感受過、經歷過別人的痛苦，但人類卻可以理解這個痛苦的感覺。「我很痛苦」這句話是無法被檢證的，就是一個例證，人類不會去檢證他人的痛苦，但卻可以理解或相信他人表達痛的意義。以上的例子中，維根斯坦闡述了一些語言情境在使用的時候，並不是可以被證偽的，這些情境多半是對於自身感覺的、宗教的、心靈世界的。此外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第 280、281、282 中也提到，有些語言的所包含的私人意義，對於他人來說並不具有意義，就如同舉例中的繪畫，這個繪畫同時具備了表達一個舞台的設計（像是指標或是符號）以及自身對舞台的想像，而這個想像對於繪畫者來說是獨一無二且他者無法經驗的。此部分尚呼應前面提到的「盒中甲蟲」，而 281 以及 282 則提到了為什麼這個「痛苦」的語言無法被經驗，卻可以被活著的人或是類似於人的行為的生物所感受。裡面中會聆聽、說話的陶罐，也是一個具備類似人類行為（說話、聆聽）的對象，而人們也會這麼說：「娃娃也會痛」當在玩娃娃的時候，此時維根斯坦另外補充了一句「但這個對『痛苦』的概念的使用是次要的 (*but this use of the concept of pain is a secondary one*)」，此時應該是呼應條目 280 中的第二個意義，繪畫中的資訊提供意義，而非是對於自身「痛苦」的描述意義。

二、 痛苦的對象

至條目 282 為止，維根斯坦說明了感受語言與一般科學語言的差異，接著必須要去了解人類在對待人類以及不同於人類的生物或非生物的態度，進而去解釋對其他客體產生憐憫的方式。條目 283 中明確提到「可以說，只有那種行為與人一樣的東西才有痛苦 (*Only of what behaves like a human being can one say that it has pains*)」，至於我們為什麼不會認為其他的東西（不同於人或類似行為的東西）會痛苦，在條目 284 中維根斯坦並無詳細地闡述原因，而是舉了一個對照的

例子：將拿在手上的石頭以及在手上蠕動的蒼蠅對比，試想二者有感覺。看似光滑無法附著意識的東西（石頭），轉向看到蠕動的蒼蠅後，似乎就出現了意識的著力點。而這個概念也與前面條目 283 所提到的「為什麼痛苦必須要有一個承受者（*Why indeed should the pain here have a bearer at all*）」呼應，也暗示了痛苦是必須要有一個承受者。同樣在條目 283 中提出一個疑問，對於將自身的痛苦這種感覺轉變成外在於自身的東西，而這種感覺不應與他者的痛苦相衝突。

我們接連爬梳了維根斯坦的幾個條目，關於他對於痛苦的語言、認定其他東西的意識有了初步的了解。在上面的討論中，我們發現了痛苦需要一個承受者，痛苦不像書、椅子、蘋果一樣是可以科學語言所陳述的客觀存在，但上述的討論卻也沒有清楚的說明，痛苦的承受者應該是什麼樣子？而在條目 286 中則利用人類自己的經驗來論證痛苦的承受者。「身體感到痛苦，這不是很荒唐嗎（*Isn't it absurd to say of a body that it has pain*）」說明痛苦時，人類並不會認為承受者是身體發生痛苦的某一個部位，而是人本身感到痛苦，人才是痛苦的承受者「人們並不安慰手，而是安慰痛苦的人（*One does not comfort the hand, but the sufferer*）」。後續的幾個條目，都是在闡述「痛苦」作為一個語言的表達，並不是一個可供檢證的科學語言，而在使用時便產生了語言遊戲的互動，最後再回到條目 293 的「盒中甲蟲」。可惜的是，條目 287 之外，並未有明確的條目討論到對他人的憐憫，而關於這個部分也並非是清楚的概念描述，如同蓋塔在文獻中提到的「如果我們使用直接的方式理解，便會失去維根斯坦的觀點（*If we took the route to be direct, we would lose sight of Wittgenstein's radicalism*）」。儘管如此，痛苦語言的日常經驗在使用時並不會要求雙方具備完全相同的感知經驗，而是建立在雙方相互知曉具備感知痛苦的能力。這部分在條目 283 中有明確的說明我們的行為是限制於那些行為或是外觀類似人的生物，但維根斯坦卻沒有多加著墨這個行為的背後原因，蓋塔則引用維根斯坦這這句話「我對他的態度便是對靈魂的態度，我並不是認為他有靈魂（*My attitude towards him is an attitude towards a soul. I am not of the opinion that he has a Soul*）」來作為後續的解釋。因為對方具備擁有靈魂的特質：表情、動作、人的外型，因此在態度上將對方視作擁有靈魂的對象來對待（憐憫），但卻不是做為他有靈魂的一個證明。換而言之，當我們根據一些外在標準假定對象具有靈魂時，也是同時將其視作可以憐憫的對象，在此概念之下，被視為具備靈魂是憐憫的條件。

三、痛苦與靈魂

痛苦被視為一個最常觸發憐憫反應的原因，我們藉由前面的論述認識到人們

感知痛苦以及認為痛苦的可能對象，在蓋塔的文獻中提到有關麻木不仁的說明，「憐憫不僅僅是一種知曉必須參與的心理狀態，其中包含了足以克服僅僅是知曉的漠不關心（*Pity is not merely a psychological state with which knowledge must engag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essential indifference which is thought to be internal to mere knowledge*）」在此，我們先將重點放在這二種的差異，單純知曉的不在意當然包含了對資訊的理解，而麻木不仁則代表了更多我們無法明說的東西在其中。我們試著用以下二個例子來說明差異：

A) 工人說「那邊的水管破裂，流了一地的水」，小明回應「謝謝你的告知」。

B) 工人說「小華昨天出車禍，雙腿斷了」，小明回應「我很遺憾，小華太可憐了」。

這二個例子我們看到了很多的不同，像是受傷害的對象不同（水管跟小華的腿）；單純知曉與憐憫的差別；受傷害對象與憐憫對象的不同（小華的腿受傷，憐憫小華）。但此時出現了一個疑問，憐憫是否一定要包含知曉？

四、 虛假意識的知曉

至此，我們先總結先前的論述，以幫助我們進行後續的論證：

一、痛苦是一種難以共享的經驗，並不是一種可供檢證的科學語言，我們藉由自身的痛苦經驗來試圖感受他人的痛苦。

二、痛苦的對象有其侷限性，我們無法將自身的痛苦放在石頭、桌子...之上，而其侷限性將我們引導至靈魂的討論。

三、要對某人產生憐憫時，除了要知曉他人的痛苦之外，也必須要具備靈魂。

在文獻的分析脈絡之下，我們歸結出憐憫的產生需要有靈魂以及知曉他人的痛苦，而憐憫是否需要知曉他人的痛苦即是本研究討論的方向。此時的「知曉他人痛苦」即是維根斯坦所認為的「虛假意識」，因為我們無法真正知曉他者的痛苦，只能像盒中甲蟲一般去想像他人的痛苦。這種虛假意識也可被視作對象是否具備靈魂的一種識別，具備靈魂才能成為痛苦的承載對象，也足以讓人產生對象痛苦的虛假意識。儘管蓋塔認為憐憫的主體在具備了這種虛假意識之後，才能發展出憐憫以及後續的行為，本研究還是希望挑戰這一概念，提出一個可能的質疑「是否可以在不具備虛假意識的同時，產生憐憫？」。

五、 心智理論與虛假意識

接著我們試圖以不同的研究概念來看看憐憫與虛假意識的可能解釋，首先我們從心理學中的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開始著手。心智理論是一種人類在演化上發展出來的能力、特定的思考方式，其功能是幫助人類理解別人的想法（Baron-cohen, Leslie, &Frith, 1985），目前學界則普遍將其定義為：「一種理解他人心理狀態或觀點的能力（*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others' mental states and perspectives*）」（O'Connor &Evans, 2019）。

在理解上，我們不妨以他的實驗作為切入點，「莎莉與安實驗（Sally – Anne test）」利用二個簡單的玩偶以及小道具，模擬出一個日常的生活情境。實驗的受測者（通常是兒童）將會觀看一段由二個小玩偶（莎莉與安）互動的表演，或者是用圖片、影片的方式進行，主要的故事情節如下：「莎莉與安是二個小朋友，一天莎莉將他的球放在洗衣籃裡面然後離開房間；接著安走進房間，將莎莉的球從洗衣籃拿出來並放在附近的小盒子裡，過了一會兒，莎莉回到房間。」在觀賞完莎莉與安的表演之後，實驗受測者會被詢問「莎莉會到哪裡去找他的球？」此時，受測者身為一個全知的旁觀者，明確的知道現在球的位置，但研究者詢問的卻是「莎莉會到哪裡去找他的球？」尋找球的主體並非是受測者本身，而是小玩偶莎莉。從莎莉的觀點思考時，一般來說人類很簡單的可以將自己用莎莉的角度去思考，進而去推論「我離開房間時將球放在洗衣籃裡面，因此會去洗衣籃找我的球」。在心智理論的幫助之下，受測者幾乎都可以回答出球的位置在洗衣籃中，但也是有特定的族群不具備心智理論的思考模式，像是自閉症、阿茲海默症或是腦部損傷的患者，在經過研究後證實缺乏完整的心智理論（Baron-cohen et al., 1985; Pineda-Alhucema, Aristizabal, Escudero-Cabarcas, Acosta-López, & Vélez, 2018; Teh, Yap, & Rickard Liow, 2018）。

心智理論幫助我們理解自身以及周遭人類的思維想法，對於維護著社會運作有重要的功能。而心智理論在兒童的成長發展中又可分為二階段，這二階段分別幫助兒童發展出不同的虛假意識（False belief），第一階段的發展讓兒童可以建立理解他者的想法虛假意識；的二階段的發展讓兒童可以建立理解他人相信第三者想法的虛假意識（Sullivan, Zaitchik, & Tager-Flusberg, 1994）。換句話說，心智理論能夠幫助人類建立如同蓋塔與維根斯坦口中的虛假意識，即是說，具備了心智理論的能力我們就可以產生虛假意識，推測出他人的可能想法，進而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此時我們將中間的邏輯做一點小調換，如果我們不具備心智理論的能力，是否還是可以感受到（產生）憐憫呢？如果我們可以跨越心智理論的幫助（不知曉對方的痛苦）是否可以直接觸發憐憫？

然而，心智理論並不像電腦的防毒軟體一樣可以藉由一個開關隨時打開或是關上，一般人無法隨心所欲的決定不使用這項能力。然而亞斯伯格症患者患者在過去的研究中證明缺乏或是只具備不足的「心智理論」，這部分也與他們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礙有所關聯(Pineda-Alhucema et al., 2018)。

六、 研究問題

循著原先的文獻脈絡，我們試圖探究知曉是否是作為憐憫的必要條件？如果不具備知曉他者痛苦的虛假意識，是否也可以形成憐憫反應呢？在心智理論的幫助之下，我們得知特定的人們（自閉症患者）是不具備形成這種虛假意識的能力（缺乏心智理論），藉著觀察自閉症患者們的行為與語言使用，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分離憐憫與知曉的關係。故本研究欲藉著觀察自閉症患者的行為及語言使用，探究其是否（1）不具備心智理論（2）能夠發展出憐憫的感受。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倫理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分析自閉症患者是否具備心智理論的能力；並且在面對特殊情境時，是否會產生憐憫反應。由於自閉症患者並非是一般人能夠大量且頻繁接觸到的對象群體，故社會大眾對於自閉症患者還是存在許多偏見與誤解，且憐憫的情境營造勢必會包含強烈的情感，無法預期會對患者們造成什麼程度的影響，根據美國心理學會在 2010 年更新的《心理學家倫理原則與行為守則》（*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中第一條明確提到，研究在過程中不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故應該避免收集研究者進行實驗法操作。

故本研究預計使用大眾影視文本中所形塑的自閉症患者作為研究對象，藉著分析這些影視文本中出現的自閉症角色，接著觀察影視文本中的言說行為作為分析。本研究不採取傳播學中常見的批判言說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不將劇中人物的言說置於社會文化結構或是意識形態中進行討論分析(vanDijk, 2006)；亦不將影視文本視為一個論述（*Narrative*），分析其後的意義以及欲表達的論述主題，或是關注於意義的共享與互動(Lin, 2011; Tsang & Tsai, 2013)。而是

採用維根斯坦式的語言分析，將影視作品中的情境視為日常語言使用，從中發掘背後的哲學意義且不強調社會結構、符號及框架模型。

二、 維根斯坦的日常語言與語言分析

維根斯坦作為 20 世紀重要的哲學家，對於哲學命題以及語言使用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其學術思想在發展前後有巨大的轉變(Forguson, 2001)，本篇是以維根斯坦後期的思想為重心，認為日常語言及其脈絡是複雜的，並非能夠全然的使用科學語言及命題的方式理解，而是必須與生活形式相結合才能理解其意義。日常語言的使用並不像科學語言一樣精準，往往需要很多對於環境脈絡的資訊才能幫助接收者理解其意義，而這些資訊包羅萬象，根據這些不同的資訊會形成不同的語言遊戲(Weerasekara, 2014)。藉著這些資訊的協助，我們可以試著理解不同的語言使用跟其背後企圖想要表達的意義。

本研究採用維根斯坦式的語言分析除了蓋塔所提出的論述及其脈絡外(Gaita, 1992)，也因為研究倫理的限制導致無法有效地進入一個具備自閉症患者的日常情境，須將影視文本中的情境視為日常情境作分析。

三、 良醫莫非

本研究使用美國影劇「良醫莫非」(The Good Doctor) 第一季的前二集內容進行分析。該劇是改編自韓國醫療劇「好醫生(韓語:굿 닥터, 英語: Good Doctor)」的內容，其基本故事架構為一位患有自閉症的醫師在進入醫療體系之後，努力學習並適應醫療工作的故事。故事劇情包含了自閉症患者以及許多展現憐憫反應的機會，劇中人物的生活會遭遇到許多值得同情的病患以及生離死別的情境，提供了研究者許多情境去觀察自閉症患者的憐憫反映，對於本研究來說是較為適合的影視文本。

肆、 結果與討論

一、 良醫莫非第一集

劇情概述：劇情講述具有高功能自閉症的醫學院畢業生莫非前往醫院參加面

試的過程，在路程中莫非遭遇到了一件意外事故，事故中有一位小男孩遭到落下的廣告招牌擊中，造成頸動脈破裂以及內出血。雖然馬上有一名醫生前往協助，但該醫生並非是小兒科專科醫生，莫非前往協助並指出正確的處理方式，隨後也跟著救護車一同前往面試的醫院。而在醫院方面董事會正在討論是否要聘用莫非醫生，因為其高功能自閉症患者的身份。而在救護車上的莫非醫生發現病人的心電圖有不尋常的跡象，因而判斷小男孩的心臟也有受到影響，但因為不擅表達被趕出醫院。隨後醫生在幫小男孩處理時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並找到還在醫院徘徊的莫非醫生，在他的協助之下找出了造成心臟受損的玻璃碎片，成功救治受傷的小男孩。而在董事會的討論中，莫非醫生在機場幫小男孩緊急處理的情境被放上網路廣為傳播，形成極大的正面評價。對醫院來說無疑是一個完美的公關事件，而且堅持聘僱莫非醫生的醫院院長也提出她的請求條件，如果莫非醫生的表現不佳，他也會和莫非醫生一起辭職，並將院長的位置讓給投反對票的醫師。而莫非醫師也隨後在董事會進行面試，表達想要成為醫生的原因並且贏得董事會的信任，正式擔任醫生的職務。

分析重點：在影集一開頭董事會討論是否要聘任莫非醫生時，雙方對於莫非醫生的特質有所爭執，這也帶出本研究同樣關心的一個的核心概念，自閉症所缺乏的心智理論是否能作為感受他人痛苦的關鍵條件。儘管在影集中的對話我們看到的是針對自閉症的語言溝通、生活自理、抽象概念...等能力的質疑與討論，但背後的真正質疑是（1）無法與人良好溝通的自閉症患者是否可以在現代醫學的集團化醫院與他人共同合作並擔任醫生（2）缺乏同理心特質的自閉症患者是否可以擔任醫生。現代化集團醫院中的科層制度與溝通能力雖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特質，也是目前各國醫療系統急需解決的問題，但其內容並非是本研究著重的問題，而第二點「缺乏同理心能力的自閉症患者是否可以擔任醫生」存在著一個看似不證自明的觀點「自閉症患者缺乏同理心且無法憐憫他人」。然而，自閉症患者缺乏心智理論、同理心且無法憐憫他人的這個概念與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產生了對話，究竟缺乏心智理論是否還是可以憐憫他人。

本影集開頭便討論到了整個影集以及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但這種純粹抽象概念的討論並不能幫助我們認識或是理解我們自身對自閉症患者的形塑，因此後續將討論到劇中人物的對話與實際互動，回到語言的使用與實際行為。當莫非醫生被拒於門外時，急診室中的醫生發現小男孩狀況異常，急忙跑出來詢問莫非醫生的診斷與評估時

「為什麼要做心臟超音波？」莫非醫生無法回答「阿...好的...他...好的」，此時另一位醫師解釋道「好的，我知道你認為他需要做心臟超音波，我們想

要知道為什麼」，莫非醫生解釋「我注意到心電圖的強度有些微的下降，心包積液」。

此時的情境很怪異，心臟超音波是莫非醫生提議要進行的，在莫非醫生被趕出急診室之後，徘徊在外也是為了想要告知醫院內的住院醫師必須要照心臟超音波確定病人情況，但在住院醫師出來詢問莫非醫生時，莫非醫師卻無法理解住院醫師的提問。為什麼明明最清楚小男孩情況的莫非醫師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顯然這個情況並非是由於問題太過困難，而是無法理解問題。我們重新檢視問題與情境，情境中二位住院醫師身穿手術衣（一位是曾經見過的住院醫師、一位沒有），急急忙忙地走到莫非醫生面前，那位沒見過的住院醫師劈頭便問「為什麼要做心臟超音波？」如果是一般人的話應該可以理解對方要詢問的是「為什麼要幫小男孩做心臟超音波？」，然而因為莫非醫生的認知缺陷，他無法根據現有的時空情境作為線索，拼湊出足夠的資訊，並理解「為什麼要做心臟超音波？」這個問句。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本劇對自閉症的描繪以及在溝通中所出現的困境，接著我們從另一個情境來檢視莫非醫生的自閉症症狀及其描繪程度。在結束小男孩的手術之後，莫非醫生坐在醫院餐廳等待董事會的面試，先前的住院醫師前往致意並歡迎他加入醫院。

住院醫師微笑地說道「你是新加入的吧？」，莫非醫生「是的」，住院醫師「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問題想問」，莫非醫生「沒有」，住院醫師「你肯定對這個地方，對這邊的人充滿好奇」，住院醫師「葛拉斯曼醫生給了我醫院地圖，我也在網路上找到地區的地圖」。住院醫師「好的...太棒了」隨後尷尬地起身準備離開。莫非醫生「我確實有一個問題」，住院醫師開心的微笑並答到「是的請說」，莫非醫生「為什麼第一次見面時你對我這麼兇？第二次見面時又對我這麼好？現在你又想跟我交朋友？哪一次是裝出來的？」住院醫師啞口無言卻又試圖想要回應些什麼，就在此時莫非醫生必須前往董事會的面試便被帶離開了。

這個情境很清楚的描繪了莫非醫生的自閉症症狀與理解他人的方式，也提供了我們一些線索去理解他的辨識能力。在經過了小男孩的救治過程之後，住院醫師也發現到莫非醫生是即將任職的同事，因此向莫非醫師致意並順便表達善意。這種行為作為歡迎新進同仁的步驟來說是十分正常的，但因為先前莫非醫生在急診室不斷喊叫要讓小男孩照心臟超音波，住院醫師為維持秩序便讓警衛驅趕莫非醫生；後又為了要得知為什麼莫非想要讓小男孩照心臟超音波去詢問他的意見；最後則是在醫院親切地向莫非醫生詢問是否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地方。這個三不同時間的會面，住院醫師都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對於莫非醫生來說是一件非常難以理解

的事情。莫非醫生對於預測他人的意圖（虛假意識）其實是存在缺陷的，但是他已經具備了分辨態度的能力，因此他可以辨識住院醫師三個時間點不同的態度與情緒，另一方面，又為什麼莫非醫生無法理解住院醫師態度的轉變？我們回到對話「為什麼第一次見面時你對我這麼兇？第二次見面時又對我這麼好？現在你又想跟我交朋友？哪一次是裝出來的？」前面三個問句都表達出莫非醫生判斷情緒與態度的辨識能力，但最後一個問句「哪一次是裝出來的？」則是證明了他無法將這三個時間點的態度歸納成住院醫師的轉變。就如同上述所提到的，我們可以理解他者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且試圖改正的意圖，舉例來說：小明正在厲聲指責一位插隊的大嬸，但路人不小心撞翻小明的咖啡並潑灑到大嬸時，小明還是會滿是歉意的向大嬸致歉。這是我們可以理解的態度轉變，我們不會問說「小明不是應該要很嚴厲的指責大嬸的插隊嗎！」，因為我們可以站在小明的角度去思考，試著去理解他的想法，這也就是心智理論的作用。而在莫非醫生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他並不具備心智理論的能力，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心智理論，才會無法理解當時住院醫師的情境(Teh et al., 2018)。

前面二個例子我們看到了本劇如何描繪莫非醫生的自閉症特質與限制，接下來則是試著回答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否需要虛假意識（理解他人）才可以憐憫？」在莫非醫生進入董事會議進行面試時，他被要求說明為什麼想要成為一名（外科）醫生。

（畫面先描繪莫非醫生小時候與朋友、弟弟一起在倉庫玩捉迷藏時，弟弟不慎失足墜落，應該是回想其弟弟死亡的情境）莫非醫生說「那天，雨的味道像冰淇淋一樣，我的兔子在我眼前去了天堂；那天，老建築內銅水管的味道像是燒焦了的食物，我的弟弟...在我眼前去了天堂」此時莫非醫生的眼眶泛淚並繼續道「我救不了他們...很難過。他們都沒有機會長大成人，他們應該要長大成人的，他們應該要有自己的孩子，並且愛著他們的孩子。我希望能幫助其他人，實現這一切。...」

還有一些畫面線索無法用文字精準表達，但影集中不斷使用莫非醫生的臉部特寫，讓觀眾可以清楚看到莫非醫生眼睛中的淚光，也反覆拍攝董事會成員的表情特寫，似乎在告訴觀眾，董事會的成員被莫非醫生的話所感動。然而在故事的後面，董事會確實提供給莫非醫生六個月的試用期，讓他進入醫院擔任住院醫師。

此時我們也迎來一個困難的問題，我們在莫非醫生的行為中可以判斷，他有強烈的情緒激越發生，而這個情緒是否是憐憫呢？這一個想要成為醫生的動機是否是源自於，憐憫那些來不及長大成人的小朋友，進而想要成為醫生並救治他們

？當然這有可能是一種類似於憐憫的情緒，因為他並不具有心智理論的能力，無法理解那些來不及長大的小朋友的悔恨，也無法理解他無法長成大人的弟弟的悔恨。但如果是一個正常的醫生（非自閉症患者）說他成為醫生的動機是為了要給這些來不及長大的小朋友長大的機會，我們是否會認為他的這個情緒是憐憫？我相信答案是會的，那我們是否也可以將莫非醫生的情緒視為憐憫呢？

二、 良醫莫非第二集

劇情概述：莫非正式加入外科的團隊之後，便跟隨梅倫德斯醫師主任以及另外二位住院醫師克萊兒、吉拉德一同會診病人。因為莫非醫生對於病人的診斷太過直接，往往造成病人不必要的恐懼以及混亂，因此梅倫德斯醫師將莫非醫生安排至繁瑣的雜務，也由於莫非不斷要求對病人進行各種檢驗測試，梅倫德斯醫師也規定護士負責限制他的行為。其中有三位病人情況特殊，第一位是一個小女孩因為腹痛就診，其他醫生認為並無大礙，但莫非醫生還是要求進行抽血檢驗；第二位是有腹部有巨大腫瘤的女性病患，擔心無法參加兒子下個禮拜的婚禮；最後一位是嘔吐的男性病患，因為嘔吐物的顏色怪異而感到擔心。迫於梅倫德斯醫師的壓力，莫非醫生還是讓小女孩以及男性病患出院回家，並向二位住院醫師建議摘除女性病患健康的腎臟已獲得足夠的手術視野，進而摘除腫瘤。就在梅倫德斯醫師對於女性病患的腫瘤一籌莫展時，吉拉德醫生提議摘除腎臟以獲得視線（莫非醫生的提議），並完成手術救回女性病患。而莫非醫生根據檢驗的結果，判斷小女孩有「腸扭轉」，在凌晨一點過後堅持到小女孩家中將他帶回醫院治療。

分析重點：在本集開始時，莫非醫生因為公車誤點而遲到，又因為對於病人診斷的直接與露骨顯得愚蠢，梅倫德斯醫師則對於他的表現不斷挖苦諷刺，並要求他去處理大家都不想做的雜務，且讓他聽命於護士的命令。然而莫非醫生對於這一切充滿不理解，當克萊兒醫生與她閒聊時才顯現出來。

克萊兒「你還好嗎？」莫非醫生「諷刺的意義是什麼？」，克萊兒醫生一時語塞，稍後回答道「有時這是一種批評人的方式，以有趣的形式，所以不會讓人太難受。」莫非醫生「那不就是撒謊嗎？」克萊兒回到「也不是撒謊，因為別人知道你說的不是真的」。莫非醫生坦承「我不擅長這個」（畫面切回到莫非醫生小時候，弟弟對別人撒謊時的情境，表現出莫非醫生無法理解撒謊的概念），莫非醫生接著說「如果我認為患者有生病的可能，我就不能讓他們出院」克萊兒醫生回覆「當然不能，為什麼這麼說？」，莫非醫生「梅倫德斯醫生今天...」...

從對話中我們不難發現，莫非醫生對於諷刺的理解確實不同於一般人，也無法正常的理解以及使用諷刺。如同克萊兒醫生說的一樣「因為別人知道你說的不是真的」，諷刺是建立在對方理解的前提之下，這也是前面反覆提到的，心智理論所提供的虛假意識。如果沒有虛假意識的存在，我們自然無法理解對方的想法，也就無從得知對方說的是不是真的；如果無法得知對方說的是不是真的，便只能從對方的實際行為以及所說的話來判斷，在此情況之下便會得出莫非醫生的結論「他在撒謊」。由此可知，虛假意識的存在（或是克萊兒醫生所說的「別人知道你說的不是真的」）便是能夠識別諷刺的關鍵。在這個情境之下，我們再一次的驗證了莫非醫生並不具有虛假意識，換言之，莫非醫生不具備心智理論的能力。

而另一個值得我們討論的是本集的小女孩，小女孩來醫院就診時表明自己肚子痛，而身旁的父母一直在爭吵，因此梅倫德斯醫生推測是由父母不斷爭吵導致壓力過大造成的腹痛，並要求莫非醫生讓小女孩回家休養即可。然後莫非醫生在後續的檢驗報告中推測出小女孩可能有腸扭轉的可能，並在凌晨一點過後仍趕往小女孩的住處並強制將他送醫。小女孩在家中發現時已經嘔吐並失去意識，開車趕往醫院的途中莫非醫生抱著小女孩感覺他的脈搏，發現心跳越來越弱，也同時回想起小時候莫非醫生的弟弟在就醫途中，倒在他懷裡的樣子。此時我們討論的重點並非是虛假意識及心智理論的有無，在先前的討論中我們已經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證明莫非醫生心智理論的能力是缺乏的，或至少是缺陷的。此時我們要討論的是，一個過去發生過的事件，因某種原因觸發了現在的情境，產生了類似的情感，這種現象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它？過去弟弟的死亡事件以及現在運送小女孩前往醫院的情境非常相似，將這二個鏡頭重疊出現在畫面之中，可以猜想導演要呈現的，是一種情感的類似性，過去弟弟的死亡帶給莫非醫生的情緒，也用一種類似的方式重現在小女孩的送醫過程。舉例來說，小明的母親因為在馬路上跌倒過世，因此小明只要在路上看到年長女性跌倒都產生一種痛苦的情緒，並且立刻幫助他們。小明對跌倒的年長女性所做的行為是什麼？小明幫助跌倒年長女性的動機我們是否又會稱作憐憫呢？

回到憐憫的本質，是對於他人痛苦的一種反應，而痛苦是不能被完全經驗的，只能藉著虛假意識的猜測去感受他人的痛苦。蓋塔在前面的文獻爬梳中持續討論到知曉後還需要有靈魂的介入，才會讓人們產生憐憫，否則單純的知曉就只是麻木不仁的表現(Gaita, 2004)。但蓋塔的文獻中也有一例十分特別，他提到了一位義大利登山家華特 (Walter Bonatti) 的例子「華特不需要假定那隻蝴蝶對於被凍死的感受，他的憐憫是因由他與蝴蝶都將會有相同的結果 (Bonatti need not have assumed that the butterfly would have sensations as it froze to death. His pity

was engaged by a sense that he and the butterfly would share a common fate)」。雖然在文獻脈絡中蓋塔是藉由區分人類與動物分別作為憐憫的接受對象，是否存在本質上的不同來討論，但在這個例子中，我們無疑的也同時看到了一個假設，當完全無法理解、感受、認知對象的痛苦時，是否能利用「結果」的方式產生憐憫？此時我們借用這個「結果」的概念，再次回到小明的狀況來看，小明幫助跌倒年長女性的動機，是否是建立在他認為這些跌倒的年長女性可能會面臨相同的、類似的「結果」？意指，是否小明相信跌倒的年長女性可能會跟他的母親有類似的結果，因此他才藉著行動幫助這些跌倒的年長女性，然而儘管完全沒有涉及到知曉、虛假意識的存在，這個動機是否也是憐憫？

重新回到莫非醫生的情境，在運送小女孩前往醫院的路途上，他回想起小時候弟弟死亡的情境，暗示著小女孩如果不趕快就醫的話也會遭遇跟弟弟一樣的結果（死亡）。此時的憐憫跟孟子所提到的「惻隱之心」屬於類似的概念：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的惻隱之心就如同此時莫非醫生的感受，孺子便是此時的小女孩，發現了一個可預見的「結果」（死亡以及入於井），便產生了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並不一定包含虛假意識、知曉，是可以僅有對於結果的預見，便會產生惻隱之心。無可否認的，惻隱之心的概念，與蓋塔舉例憐憫蝴蝶時是類似的，除了蝴蝶並非是人類之外幾無二致。然而，「結果」與「知曉」這二個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重疊的，「結果」其實也被包含在「知曉」之中，對於即將發生的可能結果所做的預測，也是一種「知曉」。儘管如此，這種「知曉」並非與蓋塔於文中提對的「虛假意識」相同，虛假意識是人類自以為具備對於他者感受的理解，就如同字面上所說的是一種虛假的，不存在的；而此時對於結果的知曉，是建立在對環境與事實的線索之上，而做出的推論判斷。由此可見，這個判斷不是虛假的，充其量只能說這個判斷不正確、不精準，但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判斷。

伍、 結論與研究限制

一、 自閉症患者是否不具有心智理論的能力？

從莫非醫生的例子中，我們確實可以發現自閉症患者不具備一定程度心智理

論的能力，在大部分的人際交流之間是沒有辦法建立虛假意識，因此會無法理解他人的想法態度。故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一「自閉症患者的行為及語言使用，是否不具備心智理論」在影視作品中得到支持，在良醫莫非的人物描繪以及故事劇情中，自閉症患者不具備完整的心智理論。

二、 自閉症患者是否會產生憐憫？

驗證了自閉症患者與心智理論缺乏的事實之後，我們必須回覆另一個問題，自閉症患者儘管無法知曉他人的痛苦，是否依然會產生憐憫？從莫非醫生的二個例子：一是要幫助那些來不及長大的孩子長大，幫助那些病童們；二是擔心腸扭轉的小女孩死去。這二個例子都是一種憐憫的表現，而研究中也發現這種產生憐憫的方式類似於孟子的惻隱之心，是根據即將發生的未來判斷作為依據，所產生的憐憫情緒。這種資訊的來源不同於蓋塔在文獻中提到的「知曉」或是「虛假意識」，而是一種主觀的判斷，儘管可能不完全正確但絕非是虛假的。然而這並不影響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自閉症患者是否會產生憐憫」，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看來，自閉症患者確實會產生憐憫，儘管不具備心智理論的能力。

三、 憐憫的靈魂、知曉的虛假意識

本研究關注於蓋塔在論文中所提到的憐憫的二個條件，靈魂以及知曉（虛假意識）(Gaita, 2004)，有別於大部分的文獻關注討論靈魂的存在以及定義，本研究則從知曉的概念出發，分析「何為知曉？」、「缺乏知曉是否還能產生憐憫？」。推論知曉跟憐憫的關係是困難的，藉著自閉症患者的症狀，研究者可以確定其與一般人的差異並且反向推論，這也是為什麼本研究是藉著非常人的行為去推論常人的行為。

蓋塔所提到的知曉是一種虛假意識，這種虛假意識是建立在心智理論的能力之上，因為相信自己可以理解他人的痛苦，這種自信就像維根斯坦的「盒中甲蟲」一般無從檢證。如今有了心理學以及醫學的幫助，我們剝離出心智理論的效果，找出了不需要虛假意識介入的憐憫。藉著孟子「惻隱之心」的說明，我們也概念化出這種對於「結果」的預測想法，也同樣可以帶出憐憫的反應。而這種對於結果的預測，也同樣出現在蓋塔文獻中，只是並非用於說明知曉的重要性。研究者認為，蓋塔並非不知道這種根據「結果」所產生的憐憫，而是將其視為知曉的一部分，卻忽略了「結果」並不具備任何概念的虛假意識，無法歸類於蓋塔所不斷重申的虛假意識。故本研究認為，人類可以在不具有心智理論的情況之下產生

憐憫。

四、 研究方法與其貢獻

本研究並非傳統的傳播學研究或分析哲學，而是藉著維根斯坦日常語言的觀點，以及蓋塔對於憐憫的脈絡，透過心理學的理论基礎去分析憐憫概念的使用情境與其限制。延續蓋塔憐憫的研究脈絡，提供一個新的觀點給予哲學的道德研究，在討論形而上的靈魂之外，也關注於生活情境的憐憫使用。在傳播學研究方面，則是藉著維根斯坦式的日常語言分析，提出一種分析文本的適用性方法。

過去的傳播學研究在分析影視文本時，慣於將文本作為一種論述、符號表徵，或是視為社會結構中的意義、意識形態載體，而非單純視為一種日常溝通的對話語意。這是由於傳播學者重視其媒介特性，了解其更勝於日常溝通的特殊性，也因為如此往往忽略其亦具備日常溝通的一般性，然而這種一般性便是本研究所要提出的。這種一般性在日常生活的溝通中隨處可見，因為他是溝通的基礎、意義的共享，但影視文本所具備的特殊性：傳播速度、範圍、影響力...賦予了不同的意義。然而很多日常生活的研究主題因為諸多原因無法在一般情境下觀察，又或者無法在研究倫理允許的情況下研究，研究者便可以藉著影視文本的幫助下在安全、合法的情境下去模擬出日常生活的一般性。就如同本研究的研究主題，具備了實驗法的研究倫理不允許，也同時包含參與觀察法的難以達成，故將影視文本的日常生活一般性作為替代，進行模擬猜想。

本研究提出這種影視文本的一般性，是將其作為研究方法受限時的一種替代方案，在追求研究倫理與合理進行研究的操作時，不失為一種選擇，也將提升影視文本分析的研究適用範圍。

五、 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關注的研究問題非常聚焦，僅分析學者蓋塔對於憐憫這一概念的必要因素，其中又著重於知曉這一部分，並無篇幅討論靈魂的部分。而靈魂是維根斯坦相關研究以及道德研究的重要概念，本研究深知靈魂的討論過於複雜並非本研究能夠掌握，也因此讓本研究討論的憐憫問題稍嫌不足。而知曉的這一部分除了借鏡心理學以及醫學的概念協助之外，也從影視文本中人物的表現與形象作切入，作為一個跨領域研究所面臨到最主要的問題便是缺乏實際例子，使用影視文本作為研究參照物並不能代表現實世界也是如此，就如同電影中的超級英雄並不存在現實生活中一樣。儘管如此，從維根斯坦分析的角度來看，憐憫的意義是存

在於語言及其行為上，我們藉著戲劇形式的對話與互動，也是一種發掘意義的過程。相較之下，如果真的去尋找自閉症患者作為研究對象也會面臨很大的問題，不論是創造出一個會產生憐憫的情境，或是這個情境對於患者會造成的後續心理影響，在權衡之下都不適合也不應該執行類似的研究。

陸、 引用文獻

- Baron-cohen, S., Leslie, A. M., &Frith, U. T. A. (1985). Does the autistic child have a theory of mind, *21*(1), 37–46.
<https://doi.org/http://dx.doi.org/10.1016/j.tetlet.2015.01.019>
- Forguson, L. (2001). OXFORD AND THE “EPIDEMIC” OF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Monist*, *84*(3), 325.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direct=true&db=a9h&AN=5105464&lang=zh-tw&site=ehost-live>
- Gaita, R. (1992). Goodness and Truth. *Philosophy*, *67*(262), 507–521.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autorpa.lib.nccu.edu.tw/stable/3751704>
- Gaita, R. (2004). *Good and Evil: An Absolute Conception*. Taylor & Francis.
Retrieved from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swdtkHVBfcC>
- Huskey, R., Bowman, N., Eden, A., Grizzard, M., Hahn, L., Lewis, R., ...Weber, R. (2018). Things we know about media and morality.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5), 315.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8-0349-9>
- 林東泰（201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初探。新聞學研究，*108*, 225 – 264。
- O'Connor, A. M., &Evans, A. D. (2019). The role of theory of mind and social skills in predicting children’s cheat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79*, 337–347.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18.11.018>
- Pineda-Alhucema, W., Aristizabal, E., Escudero-Cabarcas, J., Acosta-López, J. E., &Vélez, J. I. (2018). 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ory of Mind in Children with ADHD: a Systematic Review. *Neuropsychology Review*, 341–358. <https://doi.org/10.1007/s11065-018-9381-9>
- Sullivan, K., Zaitchik, D., &Tager-Flusberg, H. (1994). Preschoolers Can

- Attribute Second-Order Belief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3), 395–402.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30.3.395>
- Tamborini, R. (2012). Media and the moral mind. *Media and the Moral Mind*, (April 2012), 1–228.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127070>
- Tamborini, R., Bowman, N. D., Prabhu, S., Hahn, L., Klebig, B., Grall, C., & Novotny, E. (2018). The effect of moral intuitions on decisions in video game play: The impact of chronic and temporary intuition accessibility. *New Media and Society*, 20(2), 564–580.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6664356>
- Tamborini, R., Grall, C., Prabhu, S., Hofer, M., Novotny, E., Hahn, L., ... Sethi, N. (2018). Using Attribution Theory To Explain The Affective Dispositions Of Tireless Moral Monitors Toward Narrative Character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00, 1–30. <https://doi.org/10.1093/joc/jqy049>
- Tamborini, R., Hofer, M., Prabhu, S., Grall, C., Novotny, E. R., Hahn, L., & Klebig, B. (2017). The Impact of Terrorist Attack News on Moral Intuitions and Outgroup Prejudi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6), 800–824. <https://doi.org/10.1080/15205436.2017.1342130>
- Teh, E. J., Yap, M. J., & Rickard Liow, S. J. (2018). Emotional Processing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Effects of Age, Emotional Valence, and Social Engagement on Emotional Language Use.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8(12), 4138–4154.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18-3659-x>
- 臧國仁、蔡琰（2013）。大眾傳播研究之敘事取向—另一後設理論思路之提議。新聞學研究，159–194. <https://doi.org/2013.23.05>
- vanDijk, T. A. (2006).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1(2), 115–140. <https://doi.org/10.1080/13569310600687908>
- Weerasekara, R. A. D. P. (2014). A study on Ludwig 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language games and the private language argument. *Sabaragamuwa University Journal*, 12(1), 83. <https://doi.org/10.4038/suslj.v12i1.7025>
-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Macmillan Press.